

一位哈薩克斯坦漢學家的中國素描：

世界變了 我們也變了

克拉拉·哈菲佐娃是一位來自哈薩克斯坦的漢學家。畢業於塔什干大學的她，曾在母校擔任東方系中文教研室主任，更在獨立之後的哈薩克斯坦成為了總統戰略研究所高級研究員。作為研究中亞與清朝關係史的著名學者，克拉拉教授坦承：中文確實很難學，但我依舊堅持了下來。雖然已是一位長者，但是克拉拉對中國文化的思索沒有停止、對中國歷史的鍾情也未曾減少。「世界變了，我們也變了」，一聲普通話的感慨發自克拉拉接受本報記者專訪時的心中隨想，也見證了時代的滄桑巨變。

文、攝：香港文匯報記者 徐全

不久前，克拉拉教授來香港參加一個學術研討會，演講的主題是蘇聯偉大衛國戰爭時期的哈薩克斯坦。作為一個老派的漢學家，克拉拉的目光沒有停留在自己研究的中國典籍中，而是不斷關注時代的變化。漢學家的身份，給她的不僅是學者的光環，更多的是一種自我對時間與空間更替的詮釋機遇。

初學中文 在大時代的緊繃中

克拉拉的大學是在烏茲別克斯坦的塔什干就讀的。那時的烏茲別克斯坦和同處中亞的哈薩克斯坦一樣，都是蘇聯的加盟共和國。「那時，蘇聯的漢學研究中心在莫斯科；而在中亞，則是在塔什干。」克拉拉的回憶，印證了那個年代，學習中文真的不容易。「在父親訂閱的兒童報紙和陶瓷之類的中國商品上，我看到了中國的消息，也看到了中國的文字，那時起，便對中國的文字產生了興趣。」克拉拉說。

中學畢業之後的克拉拉，對東方語言的興趣愈來愈強烈。人總是追求流行的，那時的克拉拉也不例外：「那時，包括我在內，不少人都喜歡印度的電影和舞蹈，也喜歡中國的文化，特別是文字，因此對東方語言很有興趣，但最終，我選擇了學習中文。」而克拉拉給出作這選擇的理由也非常簡單：中國是蘇聯的鄰國。

學習中文，會有很多困難：「聲調，中文的聲調真的很難，我到現在，中文的很多發音都不是很準確。」不過，語言本身的難度，似乎不是最大的，師資缺乏似乎成為了當時克拉拉學習漢語的一大挑戰。

「我是1957年進入大學後開始學習漢語的，那時學習中沒有來自中國的老師，中蘇關係也漸漸開始緊張，我的老師，是來自中國的俄羅斯人。」克拉拉告訴記者，她的漢語老師來自中國東北的哈爾濱，曾經在中東鐵路工作。這些來自中國的俄羅斯人，並不被當時的蘇聯官方信任，所以將他們安置在烏茲別克斯坦。「他們很辛苦。」克拉拉用這句話概括了這個特殊移民群體經歷的滄桑。

那是一個緊繃的大時代。「我的一位老師從哈爾濱來到上海，又從上海回到蘇聯，被安置在中亞，他喜歡中國文化和藝術，家中很多的藏書都是十八、十九世紀的，還經常拿出自己喜歡的中國山水畫給我欣賞。」克拉拉說，這位酷愛中文的老師，曾經批評過自己：「因為看不懂，所以我當時不喜歡《水滸傳》，這讓老師很不高興，認為當時的我還不能夠領悟中國的文學。」當記者追問：今時今日的克拉拉是否喜歡看《水滸傳》時，她笑答：「看不了啦，因為年紀大了，眼睛花了。」

漢語學習 隨時代偏向功利

「世界變了，我們也變了。」克拉拉的這一聲感慨，來自於對蘇聯解體前後，哈薩克斯坦漢語、漢學研究狀況改變的感受。

克拉拉說，蘇聯時代，漢語、漢學的研習資源主要集中在塔什干，她本人也在那裡完成了大學課程。「但今天，在獨立之後的哈薩克斯坦，每一個大學都有漢語課程，有的中學也會有。」漢語學習的橫向範圍變大，這是克拉拉的直觀感受。

不過，身為漢學家的克拉拉，對這種漢語學習範圍的擴大，卻並沒有沉浸在盲目的喜悅中：「在蘇聯時代，學習漢語，也會學習中國的歷史、文學、哲學；但是在今天，人們僅僅只是在學習現代漢語，而沒有去深入了解漢語背後的文化與哲學，不少人學習漢語為的是在海關、文化部、外交部之類的政府部門工作，這樣的學習比較偏向於實用化。」

作為致力於與中國友好的哈薩克斯坦漢學家，克拉拉見證了哈薩克斯坦從獨立之初的艱難環境中一步一步成長的歷程，漢語的教學也是如此。她說，哈國獨立初期，缺乏漢語老師，克拉拉只好將在大市場上倒貨的那些既懂得哈薩克語、又懂得漢語的商人請來從事漢語教學工作。如今，哈薩克斯坦獨立已經二十多年，困難的歲月已經成為了往事，但這一段經歷在克拉拉看來，成為了自己漢學生涯中難以

磨滅的記憶。

幽暗歲月 期待永不回來

在克拉拉的大學時代，她曾經來到中國的北京大學留學八個月。「那是1962年，我來到了中國，但非常痛心的是，中國與蘇聯的關係已經惡化了。」克拉拉的經歷彷彿在告訴別人：宏觀的國家關係，有時其實與微觀的個人關係密不可分。

「在中國時，我想和中國的老師交流，但是他們不敢和我說話。」不僅如此，克拉拉告訴記者，當學校中的中外同學一道爬長城時，克拉拉想將自己手中的零食分給中國同學，也被婉拒。

「那時，我真的很傷心。但現在世界變了，我們也變了。」克拉拉說，蘇聯解體時，自己的一些學生收到了中國同學的禮物、零食，多會毫不猶豫地收下：「和我那一代人不同，他們新一代人，已經沒有了各種各樣的思想包袱。」克拉拉不僅是在回憶這段歷史，她告訴記者：希望今日的哈薩克斯坦能夠與中國不斷友好下去，讓曾經的幽暗歲月不再回來。這是她作為一個哈薩克斯坦漢學家的中國素描。

■克拉拉說，獨立前後，哈薩克斯坦的漢語學習狀況有了很大變化。



■克拉拉在香港發表演說。



■哈薩克斯坦著名漢學家克拉拉·哈菲佐娃。



■克拉拉的專著《中亞和東亞文明的對話》。

友誼的橋樑：談中國境內的哈薩克族人

獨立後 哈薩克斯坦重築國族精神

在許多人看來，哈薩克斯坦是一個比較世俗化的中亞國家，獨立之後的社會政治形勢比較穩定。同時，獨立之後的哈薩克斯坦，格外注重國族精神的構建，在克拉拉看來，這是國家精神的重建，也是對歷史傳統的一種回歸。

克拉拉告訴記者，獨立之後，哈薩克斯坦最大的國立大學，乃是以十世紀中亞著名的哲學家、思想家Al-Farabi(中文名：阿爾·法拉比)之名命名的。克拉拉說，阿爾·法拉比出生在今天的哈薩克斯坦的南部地區，在哲學方面的成就非常突出，影響深遠。今天，阿爾·法拉比在哈薩克斯坦受到全社會

高度尊崇，這是在獨立之後的哈薩克斯坦才出現的。

數年前，哈薩克斯坦更改了國歌旋律，克拉拉覺得，新的國歌乃是取自於一首哈薩克民歌，簡單上口，歌詞也是哈薩克斯坦總統納扎爾巴耶夫親自修改的。這一切，或許都可以看作是獨立之後的哈薩克斯坦對國族精神的一種建構與努力。

「自古以來，作為遊牧民族的哈薩克人非常崇拜祖先的靈魂，伊斯蘭宗教色彩並不濃厚，獨立後，哈薩克斯坦走的是民主化和世俗化的發展道路。」這是克拉拉教授對今日哈國社會生活的一個整體性概括。 文：徐全



由於歷史的因緣際會，在中國境內，生活着150萬哈薩克族人。哈薩克斯坦共和國議會上院議長托卡耶夫在《我們和你們：中國和哈薩克斯坦的故事》一書中提到：他們(筆者註：中國境內的哈薩克族人)都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公民，同時也能夠保持和發展自己獨特的文化和語言，與其他民族一道為當代中國的強盛貢獻力量。

克拉拉告訴記者，在蘇聯時代，哈薩克斯坦的哈薩克人的語言進行過改革，先後使用過拉丁字母、基里爾字母。在克拉拉看來，這種做法使得哈薩克斯坦的哈薩克

人的傳統斷了，因為哈薩克民族是一個注重口頭文學的民族。

但中國境內身為中國公民的哈薩克族人，情形則不同。克拉拉認為，中國境內的哈薩克族人，其語言、傳統、文化反而得到了比較好的保存。在今時今日，不少中國境內的哈薩克族人，懂得漢語，也精通哈薩克語，不少人還在中國的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生活過。因此，中國境內的哈薩克族人，在克拉拉眼中，是一個非常重要的群體——「他們是中國與哈薩克斯坦友誼的橋樑」。

文：徐全

■《我們和你們：中國和哈薩克斯坦的故事》五洲傳播出版社出版，記錄了蘇聯解體以來中哈兩國的交往歷程。